

这本小书里收集的九篇文章中的八篇，是被我的另一本书的编辑“剔”出来的。他说它们都是写国外事情的，可以单独作成一本书。承蒙丁东先生牵线，北岳文艺出版社现予出版，十分感谢。

书中第一篇《访欧片羽》，是我1987年第一次出国时写的。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不久，在外看到的一切都觉新鲜。下班后一个人住，就随手记下了一些。《在美国遇到的老板》是特为这本小书写稿，距离第一篇快三十年了，真有点不敢相信，我已在美国定居了二十五年。

儿时梦想过当话剧演员，中学教师，报社记者……没想到会从工人干到机械工程师，跟工科打了一辈子交道。尽管如此，对文科的偏好让我在业余时间还是投杂地在纸上胡拉，女儿和丈夫看过都说不错，也就开始向杂志投稿，居然都被刊用了。当然希望这本小书中讲述的“异国他乡的故事”读者也能够喜欢。



—格致文库—

给未来中国的好笔墨

异国他乡的故事

李南央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PUBLISHING AND MEDIA GROUP
BEIYU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国他乡的故事 / 李南央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78-5105-3

I. ①异…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5289号

书 名 异国他乡的故事
著 者 李南央
责任编辑 谢 放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13千字
印 张 5.62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105-3
定 价 22.00元

目录

- 001 访欧片羽
- 028 我的俄罗斯梦
- 042 女理发师
- 046 沪上遗痕 金桥晚霜
——格珍给我讲的故事
- 103 青春的音乐
——女儿和她的钢琴老师们
- 122 从《灰姑娘》的故事说起
——和政法大学“争鸣学社”的同学们座谈
- 136 在美国看西洋景
- 152 老爹都是一样情
- 156 在美国遇到的老板

访欧片羽

我在1987年年初经考试得到一次到设在瑞士日内瓦的CERN（欧洲核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那第一次接触到另一个世界的新奇和巨大冲击，今天想起还如同昨日。现在“出去看看”对国人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欧洲几日游，即便是一般收入的家庭也多能承担得起。尤其是国内物质生活与西方的水平已不相上下，互联网让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并不陌生，出国人的感受自与我当年不可同语。因此二十年前我所经历的一些往事，现在咀嚼起来别有一番“想当年”的意趣，还是值得记述的。

康姆特太太的房子

欧洲核能研究中心跨在瑞士和法国的边境线上，主设施都在瑞士一侧，法国境内也有一些实验室和办公室。初到日内瓦，我住在了CERN设在法国境内的招待所。招待所不大，三层小楼，每层有八个房间，一个公用厕所，两个公用浴室，外加一个厨房。因为中国人的做饭习惯与欧洲人不同，招待所的接待人员总是尽可能地将中国来访人员安排在同一层楼上。每天晚上中国人在一

起做饭、聊天，使我不觉身处异国他乡的寂寞。可是白天用英语思考、对话，晚上回到母语环境，这种截然的思维转换让我感到挺不适应；同时也太想利用这次难得的出国机会，脱离开中文的语言环境，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尽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更多地了解欧洲人的民风和文化。于是，在这个招待所住了不多的几日，我就到CERN的住房服务办公室寻找新的住处了。我的运气太好了，就在我向住房办公室的毛纳先生递交了找房申请表的第二天，康姆特太太向毛纳先生提出希望再介绍一个新房客给她，她家的一个房客过几天要走了。

康姆特太太出租房间给到CERN短期工作的外国人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算是CERN的老主顾了。毛纳先生告诉我，她的房子不错，只是离飞机场近，可能吵一些，让我先去看看再做决定。当天下午，办公室一位热心的同事开着车帮我找到了康姆特太太的房子。那是日内瓦郊外米冉镇的老区，没有高大的现代化公寓，是一片幽静的花园式住宅区。竹篱、铁丝网的矮篱，围出了一个美丽的院落。穿过片片绿色的草坪、密密的果林，弯曲的石径通向座座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形态各异、小巧可爱的房子，就像小时候梦中游过的《格林童话》描述的仙境。能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住处，飞机的噪音真是无须计较的小事。我在这里住下来就再也没有搬。在CERN工作的九个月中，我曾经到美国上了一个月的加速器学校，那个月我宁肯白交一个月的房钱（相当于那时我在国内两年工资的一笔巨款）也没有舍得退掉房间。

康姆特太太的房子是一幢二层小楼，楼上三个客房，两大一

小，楼下也是三个客房。楼上、楼下都有一个公用浴室，只是楼下多了一间公用厨房，因此楼下的房间要贵一些。空出来可让我租住的是楼上的小间，是六个客房中最便宜的一间，我的运气挺不错。陪我看房的同事是个德国人，可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不知用了什么招数，将康姆特太太哄得眉开眼笑，竟然恩准我免费和楼下的房客一起使用厨房。康姆特太太和她的儿子、女儿也住在楼下。他们的住室在房子的另一侧，用一个门和房客们隔开，他们有自己的浴室和厨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以为康姆特太太的女儿是她的儿媳，很久以后才搞清楚原来是女儿。康姆特太太总有七十多岁了，一双儿女看上去也有四十多岁，两人每日不声不响，女儿替房客打扫卫生，儿子整理院落的花草，房子里整日静悄悄的，只有康姆特太太的声音时不时地尖锐响起。我听不懂法语，猜测不是在对女儿发脾气，就是在对儿子不满意。因为我不懂法语，始终没有和康姆特太太建立起友善的关系，可是在这所房子里我结识了不少好朋友。

冠军皮埃尔

搬进康姆特太太家见到的第一个房客就是皮埃尔。他住在一楼紧靠厨房的一间小屋内，矮矮的个子，稀疏柔软的黄发在脑后滑稽地留出一小撮长达肩际。我在巴黎曾看到一些男青年把这一小撮头发编成一根细细的辫子，还好，皮埃尔的这一撮并没有如此梳理，否则第一次看到他，我会抑制不住自己笑出声来。

那是我搬进去的第一天到厨房烧开水，一下楼梯就碰上了皮

埃尔。他尾随着我进了厨房，自我介绍说他是法国人，还顺便介绍了一楼住的另两个房客：一个是意大利小伙子，一个是德国姑娘。皮埃尔的英语讲得不错，我告诉他我一句法语也讲不来，以后与康姆特太太打交道，还要请他多帮忙。他一口答应了，颇显出两肋插刀的意气。以后凡是我在厨房做饭，康姆特太太突然冲进来朝着我大喊大叫，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赶紧去敲皮埃尔的门求救，常常是我的手指还没有扣到门，门就已经开了。皮埃尔笑眯眯地站在那里，甜甜地招呼一声康姆特太太，老太太就立即转身冲着他嚷嚷起来。皮埃尔总是微笑地、耐心地听老太太唠叨，偶尔答上一句、两句，但是从来不充当我和老太太之间的翻译。最后不知怎么，在皮埃尔三言两语之后，老太太突然又高兴起来，哈哈笑着向我摆摆手，宣布休战。真如夏日雷雨，来得骤然，去也骤然。我急急向皮埃尔讨教，我做错了什么事引得老太太如此光火？他又向老太太说了些什么化解了老太太的怒气？皮埃尔总是耸耸肩膀，两手一摊：“没什么，你别在意。根本问题是她太老了，看到我们年轻就不高兴。”说完便哈哈大笑，一脸诡秘之色。我只好将信将疑地陪他一起“哈哈……”完事。

皮埃尔的生活十分规律，每天清晨六点左右就骑着他的跑车出去训练，他告诉我他的最好成绩是获得过法国大学生自行车赛的冠军。现在他二十六岁了，体力已大不如前，但是他准备再拼一拼，争取挤进全国赛的前三名，进入法国国家队。我真不敢相信，我原来与法国这个自行车王国第一流的运动员住在同一个屋

檐底下；而他的职业竟然是个工程师，只是业余时间进行训练。

只要我按时下班回到住处，总能碰到皮埃尔正推着跑车出门。他微笑着向我招招手，翻身跨上坐骑，挟着一股清新的爽朗的风从我身边一擦而过。皮埃尔肌肉粗壮、棱角分明的双腿有力地蹬踏着脚板，只几秒钟就消逝在公路的坡后。我总喜欢站在那里遐想一会儿，想象着皮埃尔风一般掠过边境哨卡，向着鲁拉山脉的深处飞驰而去。

每个星期五下班回到住处，皮埃尔把他的宝贝自行车装到他那辆红色小巧的汽车顶棚上，从车窗里探出头向正在厨房里忙碌的我招招手，一溜烟地没影了，他这是回法国小镇的自己家与妻子共度周末了。我问他为什么回家还带着自行车。他说，星期天要进行一整天的训练，而且他住的镇子上常常会在周末举行比赛。要知道他是镇上家喻户晓的英雄，每场比赛是一定要参加的。他曾经给我看过他精心剪贴收藏的报纸，其中有他第一次获得镇上比赛冠军的照片。那是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身旁的自行车显得那么大。再以后，自行车越变越小，那个自信、健壮，每一块肌肉都散发出不可藏匿的青春气息的金发青年，便是获得全国大学生冠军头衔的皮埃尔。

“我要参加世界比赛。”皮埃尔从我手中轻轻抽回那本剪报本，“到时送一张穿国家队运动服的照片给你。”

瑞士的生活费用很高，牛奶、黄油、面包的价格都是法国那边的好几倍，很多拿国内工资美国人、德国人对瑞士的物价都叫苦不迭。我在CERN拿的是生活津贴，这比在CERN实习的大学

生的工资还要低好多，对瑞士物价的感受就更不用说了。住在瑞士的中国人多半利用周末骑车到法国去赶集，在那边的市场上买回一周的口粮。有一个周末，我因为不能去法国采购，就请皮埃尔帮我代买一周的食品。星期一的晚上下班回到住处，打开属于我的柜橱，发现里面已经塞满了牛奶、面包，还有一大块黄油。“这是我给你买的。够不够？”不知什么时候皮埃尔已经站在我的身后，偏着头微笑地看着我。说实在，这些东西我两星期也吃不完。“够了，太够了！”我连声地道谢，赶紧摸出钱包付钱。皮埃尔拦住了我：“这是我送给你的。”我一下愣了。在我印象中，外国人是从不轻易为别人付钱买东西的。“不，不，是我请你买的，怎么能不给钱呢！”“你比我更需要这些东西。我很高兴这么做。”皮埃尔一脸的诚恳。看着他收回去的微笑，我拿钱的手停在了那里，很怕我的钱会让他不高兴。“好吧，我收下，可下次我再也不会请你帮忙买东西了。”我断然地说。皮埃尔嘻嘻地笑了。

回到房里，我想来想去心里不踏实，觉得这事办得真是不好。翻了半天箱子，找出了一个从国内带来的小巧精致的指甲刀，又翻出一个有金色小铃的钥匙环配上，拿在手里去敲皮埃尔的门。我提着钥匙环在皮埃尔的眼前一晃，小铃发出轻轻的叮叮声。皮埃尔的眼睛一下亮了：“给我的？”一把就抓住了这两件小东西，然后双手捧着细细地翻来覆去地看，“哇，太感谢了！”看得出，他真的喜欢。再一个星期一，他在厨房里碰到我，一本正经地说：“我的妻子很喜欢你的礼物，她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真想不到，皮埃尔和妻子会这样郑重地对待两件小小的玩意，我

的眼睛有些湿润。

后来，皮埃尔的妻子，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来瑞士过暑假。康姆特太太只接受单身房客，他只好另找房子搬走了。他搬家的那天我不在，连个再见都没说上。临回国的前两个星期我在CERN偶然又碰上了皮埃尔，我告诉他我就要回中国了。他流露出惜别之情，说他可能很快也要回法国了，他的妻子大学毕业了，很快就要拿到律师开业执照，他要随妻子去她工作的城市居住。我知道我们无缘再见了。

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萍水相逢的朋友，许多人当时是朋友，分了手，就渐渐忘却了。可我不会忘记皮埃尔：一个酷爱自行车运动的法国青年，一个热心帮助素昧平生的中国人的法国青年。只可惜我没有留下一张他的照片。

多米尼加给我上的课

见到多米尼加是在我搬入康姆特太太房子的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厨房吃饭，进来一个小伙子。“Hello!（你好）”声音很亲切、友好。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错，显得单纯、天真，一头卷卷的黑发，大大的眼睛也是黑色的，高鼻梁上架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年轻人的活跃中又透着几分老成。我想，这大概就是皮埃尔说的意大利小伙子了。我报以“Hello!”和一个中国式的大姐微笑，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他匆匆拿了件东西就走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周末。早晨我在厨房吃饭，多米尼加也进来用餐，我们就边吃边聊。知道我是一个人在这里，他直爽地

问：“我们一起进城好吗？”我说：“行。”“那我等你，十五分钟后楼下见。”真简单！他也不调查调查我的表现、政治面貌、思想倾向……。即使“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六七年，这种交友前的思考模式在中国还是普遍盛行的，多米尼加的见面熟，让我觉得有几分新奇。

我们上了公共汽车，一路聊了起来。首先自然是互通姓名。我这几天记外国人的名字已经是头昏脑涨，幸亏他的名字与多米尼加这个国家几乎同音，管它是否准确，能凑合着记住就行。好在他也并不认真纠正。多米尼加的英语，说心里话，我实不敢恭维，不过我的英语也比他强不到哪里去。我俩连蒙带唬地，交流还真没问题。“我哥哥公司里有几个中国人，他们和我哥哥是好朋友。”原来如此，看来受哥哥影响，所以对我这个中国人十分友善。“听说你们中国人在这里挣钱，回到中国花有困难，是吗？我哥哥的那几个中国朋友都在香港买东西。”这话问得可有点愣，中国已经不是铁幕后的国度了。我告诉他，现在中国已有了免税商店，用外汇买东西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回国后要在规定的期限内购物，否则指标就作废了。他听了，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我在大学有个老师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他在那里碰到很多中国人。你知道我的老师怎么看中国人吗？”“怎么看？”我以为评价会很不错。因为据我所知，国内很多学生在美国十分出色。“他说你们中国人是slave（奴隶）。”

“Slave？”

“不是好词，我很抱歉。”

我赶紧拿出须臾不离身的小字典，slave：奴隶。我有点不高兴了。哪有刚刚认识，就对我这个中国人这么评价我的同胞的，未免太唐突了。“你的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多米尼加根本看不出我的不悦，回答说：“老师说中国人挣得很少，可他们认为已经得到很多很多了。老板交给他们一个项目，他们就没日没夜地去做，不休息，不玩儿，一个劲地干，老板却因此得到了时间去干他自己想干的事。等中国人的工作完成了，老板拿现成的结果。中国人又得按老板的要求去干新的项目。他们只知道按老板的布置去干，甘愿受人驱使，不就像奴隶一样吗？”

我一时无言以对。我一向以为中国人的勤奋是最可引为自豪的中华美德，没想到这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和他的老师竟然是如此看待这种我们引以为荣的品德的。我得感谢这个年轻人的坦诚，让我了解到中国人的“勤劳”其实给至少是一部分外国人留下的并不是“好印象”。后来过复活节时，我和一些朋友到巴黎玩了五天，回来挨了在CERN管理我们这些中国访问学者的负责人的好一顿批，这位领导要求我们假日也要工作，以给外国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我似乎对多米尼加的思维方式不怎么反感了，甚至感到他的分析不无道理。我不禁又想起了到CERN工作的第一天的午休时间，我一人待在办公室记上午工作中遇到的单词，我的老板走进来坚决地制止了我：“Never（从不），ever（永远）！”“你要学习工作，你也要学习生活，你到这里应该学习这里的一切！”我似乎领悟到这些外国人的思维：一个只知道工作的人不是真正的人，

只是工作的奴隶——他们并不推崇这种精神。

除了皮埃尔、多米尼加，楼下住着的另一个房客是位叫萨宾娜的德国姑娘。萨宾娜是搞物理的，在CERN已经工作了两年，她的合同还有一年才到期。这是个非常勤奋的姑娘，从不睡懒觉，每天很早就起来锻炼，星期天也不休息；只是太不拘小节，对别人是否已经起床不管不顾，只要自己起来了，就搞得叮当乱响，搅得别人也睡不成。早锻炼回来后，在洗澡间磨磨蹭蹭且出不来，光是嗡嗡地吹头发就要花半个小时。开始皮埃尔和多米尼加只是抱怨、抱怨，事情似乎还不太严重，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萨宾娜上班的时间推迟了，每天早晨的洗澡时间改在了七点，而恰恰这时多米尼加的老板要求他每天必须在八点半前到达办公室，事情因此开始有些不妙。一天晚上，多米尼加对我说：“昨天早晨萨宾娜在洗澡间整整待了一个钟头，我只好在厨房洗脸，我太生气了。今天早晨我听见她锻炼回来的声音，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抢在她前边冲进了洗澡间。”我想象着多米尼加冲刺般钻进洗澡间的情景，不禁哑然失笑。“我在里面故意泡了一个钟头才出来。我就是要气气她，看她怎么办！”我说：“这可不太好，你这样做有点差劲。”多米尼加立即激愤地反驳说：“为什么她可以在洗澡间待上一个小时，我就不行？为什么你不说她不好，反而觉得我不对？”这可让我怎么回答呢？告诉他我们中国人信奉互相谦让，他会说：其实你们中国人最爱斗来斗去了；告诉他中国人遵循有事好商量、别伤了和气的原则，他会说：干吗要讲和气，我们对洗澡间有平等的使用权，她怎么干，我也怎么

干。是啊，思维方式不一样，很难讲得通。不过萨宾娜是真生气了。晚上，我、皮埃尔、多米尼加正在厨房聊天，她进来拿东西，只淡淡地对我一笑，对其他两位故意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剩下我和多米尼加两人在厨房时，萨宾娜走过来无缘无故地从外边将厨房门拉上，我俩正奇怪所为何来，就听见她“哐哐”进了洗澡间，哗哗地响起了一片水声。多米尼加被这个明显的挑衅惹恼了，立即站起来冲到门那儿，将厨房门一把拉开，门被重重地撞到墙上发出“咚”的一声。我想，如果这时萨宾娜还在走廊，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了。

好在多米尼加很快就搬走了，否则真不知这场浴室争夺战如何了结。多米尼加搬走的原因是他的女朋友要来日内瓦休假，无论他如何向康姆特太太求情，老太太就是不允许他的女朋友也住在这里。无可奈何，他只好另外找了地方。

无巧不成书，没想到十五年之后，当我转到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工作时，又遇到了多米尼加。他已是人到中年，一头卷卷的黑发中间已经开谢。这次他不是我的邻居而是我的顶头上司了，领导着我和另一位退休后返聘的日裔美籍高级工程师做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第三代光源的磁铁项目。他那种好争好斗、不大看得起亚洲人的个性似乎发展得更甚了些，领导了我俩不多的时候，那位资深日裔磁铁专家就忍无可忍，拒绝执行多米尼加一个接一个的指令。日裔专家跟我聊起来，大有“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之势。上边没有办法，项目已经开始，两个人舍了谁都麻烦，只好撤了多米尼加的组长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饭碗，由

工程的总工程师对我们三人实施直线领导，项目才得以安然完成。我这时悟出，即便中国人有很多缺欠，有很多不足，需要向其他的民族取长补短，其他族裔的人又何尝不应如此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要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中工作和生存，所有种族的人都要了解、包容、宽待其他族裔的文化，只有这样，大家才能融洽相处，合力工作。多米尼加的悟性似乎差了一些。

多彩的克利斯婷

皮埃尔搬走后不久，一位在联合国总部担任翻译的英国中年妇女顶替了他的位置。她叫克利斯婷。我终于有了一位母语是英文的邻居。初次见面，克利斯婷就对我滔滔不绝地呱呱啦啦，听得我云里雾里，只得不好意思地打断她，请她放慢速度。自此，她成了我的不收费的英语教师。只要晚上能在厨房碰面，她就至少和我聊上半个钟头，训练我的听力。她还时不时地让我品尝她烹调的“美味”。其实不过就是一锅“大杂烩”，七七八八的蔬菜混在一起，加盐加水一煮就成了。回报她的好意，我也常请她和我一同进餐。康姆特太太不允许炒菜，再加那时日内瓦也买不到中国调料，我所做的无非是鸡蛋饼，凉拌土豆丝、芹菜丝什么的，克利斯婷总是对我的饭菜赞不绝口。

克利斯婷讲得一口漂亮的法语，在我听来和法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再加上她说话时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就更是优美动人。她把康姆特太太哄得团团转，本来一天到晚阴沉着个脸，

好像所有的房客都欠她房钱的老太太，只要一见到克丽斯婷，满脸的皱纹便笑成了一朵菊花。克丽斯婷不无炫耀地对我说，老太太的房子只租给年轻人，她这种中年妇女老太太是坚决拒租的，可是她有本事三下五除二就将老太太拿下，高高兴兴地把房子租给了她。而且她还从老太太嘴里套出和老太太同住的一男一女是老太太的儿子和女儿，她猜老太太不愿意有中年男女入住，大概是怕勾引走她的一对宝贝儿。克丽斯婷边说边摇头：“可怜的人儿，老太太不死他们永远不会有自由。”

看到克丽斯婷和老太太的关系如此之好，我就请求她帮帮我。我告诉她，在CERN的招待所用洗衣机洗一次衣服，相当于我在中国一个星期的工资，而且我只有两套内衣可供换洗，无法像从其他国家来的人那样，攒一大堆衣服再抱去用洗衣机洗一次，因此我总是每晚洗澡后将换下的内衣用手洗干净晾在自己的屋内。老太太为此常常向我咆哮，有时甚至把没有全干的衣服扔到我的床上来表达她的愤怒。我告诉克丽斯婷，其实我是将衣服拧得干得不能再干了，保证不会有一滴水滴到地板上的，老太太这样对待我实在没有道理。克丽斯婷一口答应了帮助我去向老太太讲情。联合国的雇员大概有着非同一般的谈判本领，从此老太太再也没有因为洗衣服的事找我的麻烦，而且对我的态度也明显地好转，发脾气的次数减少了许多。

多米尼加搬走后，他的房间住进了克丽斯婷的一位年轻的同事依塔。依塔也是英国人，和克丽斯婷在一起担任翻译，不过她是实习生，不似克丽斯婷是联合国的正式雇员。从依塔嘴里，我